

文化线路视野下的唐蕃古道

胡 成 霞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 唐蕃古道是中国历史上一条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今天作为一条知名的旅游线路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举措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从文化线路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条古道,必将会有新的收获。

关键词: 唐蕃古道;文化线路;文化遗产;保护开发

中图分类号: C91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730(2012)04-0092-04

收稿日期: 2012-02-19

作者简介: 胡成霞(1976—),女,青海互助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民族文化史与旅游文化研究。

唐蕃古道是青藏高原上我国汉藏兄弟民族友好往来,进行政治、文化交流的纽带,经济贸易的命脉,藏史称为汉藏黄金桥。^[1]唐蕃古道自唐代以来是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起自陕西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拉萨,全长 3 千余公里。今天作为一条知名的旅游线路仍然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举措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从文化线路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条古道,必将会有新的收获。

一、文化线路的定义

文化遗产是指人类社会所承袭下来的前人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2]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批判吸收前人经验、不断创造新文化的过程,是一个民族引以为豪的文化记忆,是人类社会弥足珍贵的财富。当前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早在 19 世纪初一些国家的政府已开始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对文化遗产进行专门的保护,随之一些国家也设置了相应的保护机构,诸国的努力致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人类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

文化线路是一种新的遗产保护尝试,1994 年在西班牙召开的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文化线路”的遗产保护概念。1998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正式成立,在其指导下,开始系统讨论文化线路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其保护措施。2003 年 3 月 17 日至 22 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巴黎总部召开会议,专门在其《行动指南》的修订中加入文化线路保护的内容,把文化线路定义为: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

身具体的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不断地得到体现。”^[3]文化线路无论是作为重新审视人类遗产的新视野和思维,抑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还是作为新的遗产保护类型,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4]

二、唐蕃古道作为文化线路的判别特征

1994 年马德里会议形成的附加文件讨论了文化线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判别标准,以以下四点为基础^[5]。

时间特征: 只有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文化线路才可能对它所涉及的社区文化产生影响。

空间特征: 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反映了文化线路所代表的交流是否广泛,其连接是否足够丰富多样。

文化特征: 即它是否包含跨文化因素或是否产生了跨文化影响,指它在连接不同文化人群方面的贡献。

角色和目的: 它的功能方面的事实,例如曾对文化宗教信念或贸易的交流起到的作用,并影响到特定社区的发展等等。

(一) 唐蕃古道的的时间特征

唐蕃古道大致定型于唐朝初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唐初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唐太宗时期开始进入了全面对外扩张阶段,贞观年间,唐朝取得一系列对外用兵的胜利,一度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威胁的东突厥灭亡后,四夷君长皆入朝请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唐朝皇帝就成为四夷的最高首领。几乎与此同时,西藏地区雅隆河谷悉补

野部先后兼并青藏高原上的苏毗、象群、党项等部，统一全境，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吐蕃王朝很快成为了唐王朝最强劲的对手，正如陆贽在《论抵御吐蕃策》中所言“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之甚患者，莫大于吐蕃。”^[6]吐蕃的崛起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尤其对中国西部而言意义重大。范文澜先生这样评价“原来寂寞无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7]

贞观八年(634)吐蕃向唐遣使求婚不成，认定是吐谷浑从中作梗，遂攻吐谷浑，进而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甲，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于我，即当入寇”。^[8]唐朝拒绝了这样武力的求婚，派出五路大军取得了吐蕃战争的胜利。松州会战后松赞干布遣使谢罪，再次求婚，唐太宗许婚。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护送公主入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河源迎娶。文成公主是唐朝第一位嫁入吐蕃的公主，她的行程为唐蕃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踏着文成公主的足迹再次踏上了赴蕃的道路。在唐蕃近三百年的交往中，双方使臣频繁往来于长安与逻些之间，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得到加强。

(二) 唐蕃古道的空间特征

唐蕃古道的主干线大致走向为：从西安出发，过咸阳，沿“丝绸之路”东段西行，越陇山，经甘肃天水、陇西、渭源，到临洮分两路：或北上兰州，沿黄河北岸西行至乐都到西宁，或西北行至临夏，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河，进入青海民和官亭，经古鄯、乐都到西宁。这段路线是唐朝京城到河湟地区的驿道，丝绸之路的南线，是历史上联系东西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陆路交通干线之一。唐蕃和好，这条道路又成为唐朝与吐蕃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主要道路。

从西宁再向西到达湟源、登日月山，涉倒淌河，到恰卜恰，然后经大河坝、温泉、花石峡、自花石峡西南行75公里，到达玛多，玛多是藏语，意为黄河沿，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渡口。绕扎陵湖和鄂陵湖，翻巴颜喀拉山，过玉树清水河，西渡通天河，到结古巴塘，溯子曲河上至杂多，过当曲，翻越唐古拉山脉的查午拉山口进入藏北草原，沿青藏公路的南段，经西藏聂荣、那曲，最后到达拉萨。这段道路是唐蕃之间开始交往以来开辟的道路，也是唐蕃古道中最具特色的一段路程。从地貌特征来看，这段路程极具特色。唐蕃古道穿越的青海境内的两大地貌区，即东部低地区和青南高原区。其中“日月山是我国重要的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是我国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外流区域和内流区域的分界线，是传统观念上黄土高原最西缘、青海省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东西两侧的自然景色在较短距离内截然不同。”^[9]不同区域的地势高低导致了自然生态景观的极大差异性，三个区域的历史发展背景又有显著的差异性，形成了江水源文化三种不同文化类型，即多种文化相交融的柴达木盆地绿洲文化、青南草原高原文化和河湟多元文化。^[10]唐蕃古道在青海境内则途经了后两个文化区，沿路流传有大量有关文

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传说，并留下许多珍贵遗迹。

(三) 唐蕃古道的文化特征

唐蕃古道作为一条汉藏文化交融的通道，使得不同文化在此交流与碰撞，并留下大量丰富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唐蕃古道上留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古道沿途有双方反复争夺的石堡城，标志着唐朝为吐谷浑复国失利的大非川之战的古战场。文成公主进藏途经玉树县巴塘乡西北约四公里的贝纳沟，命人在悬崖上刻的九尊佛像及吐蕃大臣吞米桑布扎亲手书写的藏文、梵文及汉字楷书等刻文。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途经此地，为了不让文成公主主持雕刻的佛像被风雨侵蚀，命随从盖一殿堂以遮风避雨，并赐名文成公主庙。玉树勒巴沟沟口的一座佛塔和沟中一幅“礼佛图”，据说都是文成公主进藏留下的遗迹。

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时驻留过的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恰不恰、扎陵湖、鄂陵湖等地，都流传着有关两位公主的美丽传说，为这些风景添色不少。藏族传说中：种植青稞、小麦、豌豆及使用水磨、养羊，以及造屋、织毯等等的技术，都是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带去的大批工匠传给吐蕃的。吐蕃虽然是农牧兼营，但依然以畜牧为主，农业生产相对落后，西藏山南地区的农民传说“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是文成公主所传去的。相传文成公主还带去了芜菁种子。这样的传说在唐蕃古道沿途各处随手可以拈来，这些传说不仅记录了唐蕃之间源远流长的深厚友谊，也成为古道丰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唐朝是个诗歌的国度，诗人们也将目光投向了西陲边地，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出使吐蕃，很多人都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和表达。由于国家的强盛，朝廷对边功的重视和大力奖赏，极大地激发了文人建功边疆的热情，许多人亲身投入到金戈铁马的戎旅生活，他们关注民族关系，歌咏边塞生活，积极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诗歌中涉及了唐蕃之间和亲、使臣往来、战争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是我们了解唐蕃古道上汉藏交往情况的重要史料。

(四) 唐蕃古道的角色和目的

唐蕃古道自唐以来对于沟通中原与西藏、加强汉族与藏族为主的其它民族之间的交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交融的路线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吐蕃王朝时期是青藏高原社会大开放和大发展的时代，是青藏高原整体文化形成和奠基时期，同时也是藏民族这一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开始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11]在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吸收过程中，唐王朝的影响占据非常醒目和重要的位置。

吐蕃原本信仰苯教，松赞干布分别从尼泊尔和汉地迎娶了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传入吐蕃，这对吐蕃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文成公主入蕃时携带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和大量佛经。金城公主入蕃后将因吐蕃灭佛而被埋藏的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供奉于大昭寺。在她俩的努力下，许多汉僧到吐蕃弘法，对于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对吐蕃思想

文化产生影响的还有汉地的儒家文化。文成公主入蕃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渐慕华风,派贵族子弟入唐国学习《诗》《书》,他们从小入国学读书,饱受儒学的熏陶,可以算得上是中国通了。薛登的《请止四夷入侍疏》中说他们“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他们在系统地学习儒学典籍,经过考试后,有的被唐朝留用赐给官职,而绝大多数则回到吐蕃担任重要职务,成为专门从事唐蕃政治、文化交流官员。金城公主入蕃后又向唐要《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中宗李显专门颁布《准蕃人读书国子学敕》规定“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这些活动都无疑大大促进了唐蕃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

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还表现在生活习俗方面。松赞干布在河源迎文成公主时,就“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以后则因文成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12]。上行下效,自文成公主和亲后,在吐蕃赞普的影响下,吐蕃上下对中原的丝织品十分喜爱。传说文成公主曾亲自教授吐蕃人纺织和刺绣工艺,在两位公主带去的工匠中肯定也不乏擅长针织之工。唐蕃之间使臣来往,唐朝经常以织物作为礼物。唐蕃之间的贸易往来中,织物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可以想象,大量的中原织物进入吐蕃对当地人的服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随着吐蕃攻陷许多唐朝的领地后,汉藏人民之间杂居现象大大增多,服饰文化的相互渗透进一步加强。“如青海吐蕃墓中出土的黄底宝花绣鞋,在黄绢上用白、棕、蓝、绿等色,采用锁绣法绣出艳丽的唐草、宝花。”^[13]《新五代史》记载“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14]吐蕃的服饰文化也同样影响了唐朝。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言“天宝初,贵族士庶好衣胡服”,唐人偏爱的胡服中就有用“乌羊毛”织成,顶部略尖,四周织有花纹的蕃帽。^[15]就连文成公主要吐蕃人罢去的赭面习俗也为中原人所接受。白居易的《时世妆——倣戎也》中有生动的描写“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饮食习俗方面也有相互的交流与影响。吐蕃人喜食乳肉,中原人喜饮的茶水具有去腥除膻,促进消化的作用,深受吐蕃人欢迎。《汉藏史集》中记载了有关茶叶的传说:某一个时候,国王都松莽布支生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学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之时,一只不知名的小鸟衔来带着几片叶子的树枝,茶汤治好了蕃王的疾病。吐蕃臣民在吐蕃各个地方寻找,最后一个大臣在汉地找到茶叶。后来吐蕃使臣又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来制造了茶碗。^[16]由此可见茶叶和茶碗都是从汉地传入吐蕃的。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常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17]其饮用的茶叶种类如此之多,可见吐蕃人对茶叶的喜爱。藏语呼茶为“檟”,我国自唐以前亦呼茶为檟,《尔雅》云“檟,苦茶。”;藏语称磨为“砮”,我国唐以前亦磨为“砮”,茶与砮皆自唐时输入吐蕃,足为藏文曾酌采汉文音义之确证。^[18]

民间交往中还包括手工业技术的相互传播。随着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和汉藏僧人的相互往来,汉地的铸钟在唐代时传入吐蕃,昌珠寺的铜钟就是由“唐比丘大宝监造”。^[19]有不少学者认为马球也是从吐蕃传入唐朝的。^[20]说明在体育娱乐活动中也是交流不断。

2. 经济贸易的通道

据汉、藏史料记载,唐蕃之间使臣频繁往来于长安与逻些之间,他们不仅担负着两国政治交往的任务,同时也担负起商业贸易的职责。作为使臣一般会携带种类丰富的礼物,唐赠给吐蕃的礼品主要是以丝织物为主,有杂彩、丝布、绫、缦等,如开元二十一年正月,李嵩使于吐蕃,送国信物一万匹,杂以五彩。^[21]吐蕃使臣入唐携带的礼物则有金银财宝、玉器、方物、各种动物等,如贞观二十年唐军东征返回,松赞干布“遣禄东赞来贺,并献金鹅”^[22]。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换。吐蕃使臣到长安后还会购买当地的产品,进行经商活动。张鷟的《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写道:“听其市取,实可威于远夷,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可见唐对于吐蕃使臣的经商是持友好与宽容的态度的。

“缣马交易”与“茶马互市”是唐蕃经济交流中重要的内容和方式。马在古代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武器。唐良马主要源于吐谷浑及党项所在的今甘青川边一带。唐以缣一匹换良马一匹,谓之“缣马贸易”。麟德二年(665)之后,吐蕃占领了党项及吐谷浑地,又不时掠夺兰、渭等地,控制了唐朝良马的源头。为改变局面,开元年间派太仆卿王毛仲主持马政,与吐蕃在赤岭互市换马。中唐后,双方又在多地展开通市,唐以吐蕃臣民急需的丝绸、茶叶等生活品互市换马。

3. 构建友谊的桥梁

唐蕃交往史上共有两位唐朝公主嫁入吐蕃,这两位公主都深明大义、勇敢智慧,为唐蕃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四十年,不仅为吐蕃带去了唐朝先进的文化技术,在她嫁入吐蕃的几十年也是唐蕃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两国之间保持了相互友好的局面,没有出现过大的冲突。金城公主入藏时唐蕃关系已趋于紧张,但是她还是尽其所能改善唐蕃关系,唐蕃赤岭会盟就是在她的斡旋下达成的。

唐蕃之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并没有阻挡来往于唐蕃古道上使臣的步伐。他们同样为唐蕃关系的改善并最终实现唐蕃之间长久和平做出了贡献。唐蕃之间有使臣往来始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吐蕃赞普遣使朝贡,太宗遣冯德遐往抚慰。从此唐蕃之间使臣往来不断。王忠先生根据汉文典籍有关唐与吐蕃使臣往还记载初步统计,“自公元634年至842年二百零九年间,唐使入蕃有五十二次,蕃使来唐有一百次,平均一年零四月吐蕃与唐朝之间即有使臣来往一次。其中如贞观二十三年、天宝十三载、贞元三年、长庆二年,皆一年之内唐使入蕃两次,而建中四年则遣使三次,贞观二十三年、万岁通天七年、开元八年、大历九年、贞元二十年、开成二年,一年之内吐蕃使臣来唐二次;开元十八年、宝应元年、长庆四年,皆一年之内来唐三次,长庆元年则达四次。出使

任务有和亲、告哀、吊祭、修好、议盟、盟会、封赠、朝贡、求和、慰问、约和、责让等。除责让外余皆正常和好关系。”^[23] 由以上的统计可见唐蕃之间使臣来往之频繁，他们为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是不可估量的。

汉藏两族人民正是通过唐蕃古道这座桥梁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持久而稳固的友谊，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两个成员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唐蕃古道从特征上可以判别为文化线路遗产，它所具有的丰富文化遗存与独特地貌风光，使其具备了极高的旅游价值。目前唐蕃古道已被开发为旅游线路，但是对它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缺乏一个系统的规划，加上路线涉及多个省区，相互之间的合作协调还有待加强。途经地区又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关配套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唐蕃古道的开发和利用，也妨碍了对唐蕃古道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另外在理念和方法上如何认识和保护古道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文化线路概念的提出无疑给予很大的启示。我们应从更宽广、更深远的视野来接受“文化视野”这个概念，“文化线路”作为一种视界、一种理念、一种保护策略和方法，最终成为一系列标准，指导和判决关于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实质性研究。^[24] 因此，从文化线路的视角来审视这条古道，加强对唐蕃古道的宣传和保护，必将让这条悠久而美丽的古道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 考 文 献】

- [1] 崔永红等. 青海通史[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09.
- [2] 顾军, 苑利. 文化遗产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5.
- [3] CIIC. 3rd Draft Annotated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in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Madrid, Spain, 2003. 转引自赵逵, 川盐古道 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

- 落与建筑[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9.
- [4] 李林. “文化线路”对我过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4).
- [5] CIIC. Reports. Madrid, Spain, 1994. 转引自赵逵, 川盐古道 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20.
- [6] 范学宗, 王纯洁. 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Z].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173-174.
- [7] 范文澜. 中国通史(四)[M]. 北京: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出版社, 1949: 58.
- [8] [北宋]王若钦等. 册府元龟·外臣部悖慢[Z]. 卷 997.
- [9] 张忠孝. 青海地理[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9.
- [10] 张忠孝. 青海地理[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45.
- [11] 石硕. 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性特征[J]. 四川大学学报, 2000(4).
- [12] [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吐蕃传[Z]. 卷 196.
- [13] 华梅. 服饰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720.
- [14] [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四夷传[Z]. 卷 40.
- [15] 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458.
- [16]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 陈庆英译. 汉藏史籍[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43.
- [17] 黄奋生. 藏族史略[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126.
- [18] 任乃强. 任乃强民族论文集[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0: 26.
- [19] 藏族简史编写组. 藏族简史[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80.
- [20] 阴法鲁. 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J]. 历史研究, 1959(6). 转引自周伟洲. 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48.
- [21] 册府元龟[Z]. 卷 653 奉使部称旨.
- [22] [北宋]王若钦等. 旧唐书·吐蕃传[Z]. 卷 196.
- [23] 王忠.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Z]. 北京: 科学出版社, 41.
- [24] 姚雅欣. “文化线路”的多维度内涵[J]. 文物世界, 2006(1).

【责任编辑 朱世广】

Tang-Tibetan Roa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outes

HU Cheng-xia

(Qingha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ing 810007, Qinghai)

Abstract: Tang-Tibetan Road is an important politic, economy and culture path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s a famous travel route and reserving much cherish cultural heritage today, it has a very prospective travel development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New measures of Culture routes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s cultural heritage. Lots of new and valuable results can be found when studie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oute.

Key words: Tang-Tibetan Road; culture route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